

战争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基督教会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研究^{*}

杨天宏

内容提要 1930年代后期,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发起了一场旨在服务西部民族地区以巩固抗战后方的运动,号召教会内外有为之士,到当时被称为“边疆”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生计、教育、医疗卫生等多方面的服务工作。此外,总会还联络研究机构及学者从事边疆研究,形成服务与研究的互动,促进了边地尤其是川康地区的社会进步以及与边地相关学术的发展。边疆服务是基督教自1807年传入中国以来第一次在中国政府支持下从事的大规模社会活动。这场运动延续到1955年,不仅经历了战争的洗礼,也经历了新中国建立之初剧烈的社会转型。边疆服务的历史,对于认识基督教传教活动在近代中国经历的变化,提供了一个为以往的研究忽略了的重要例证。

关键词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 边疆服务 边疆研究 社会福音

1937年7月,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大片国土沦丧,国民政府西迁,为基督教实践其提倡已久的“社会福音”事业提供了机遇。应抗战建国及教会事业发展之需,在基督教人士的鼓动和国民政府的支持下,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于1939年成立边疆服务部(Border Service Department of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以下简称“边部”),号召全国青年男女有为之士,到当时称之为“边疆”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从事社会服务。边疆服务的主要内容有:增进边民智识水准的教育服务,改善边民物质生活的农业生计服务,解除边民疾病痛苦的医疗卫生服务以及旨在提升边民精神生活的基督教传播。这些服务在川康少数民族地区曾起到较大的作用,对该地区的社会发展做出过有益的贡献。余牧人在《抗战八年来的中国教会》

^{*} 本课题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课题名称:“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研究”,课题批准号:02EJ001。

一文中指出,边疆服务是“教会在抗战时期中最有创造性最有建设性的一种新工作,对教会,对国家,都有莫大的贡献”,代表了“中国教会今后的工作路向”。余氏的评价仅着眼抗战期间,事实上,边疆服务运动延续16年,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新中国建立之初社会转型三个历史时期。从社会功效的角度考量,边疆服务最为可圈可点的时期固然是抗日战争开始后“边疆”被视为民族复兴基地的若干年内,但若从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的角度考量,因其包含了政治变迁、世事转移的特殊经历,则抗战胜利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后最初几年内边疆服务的历史,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和认识价值。

对于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开展的这场历经不同时代、能够清晰反映外来宗教在近代中国际遇的宗教及社会服务事业,现有学术研究状况实在难饜人望。可供检阅的著作仅寥寥数种,且均非专门研究边疆服务的学术成果。即便部分章节以少量篇幅涉及这一事件,也大多属于简介性质,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所依据的史料也十分有限,不仅基本没有作档案调查,就连《边疆服务》与《边疆服务通讯》这类基本材料使用也不充分。这无疑与事件的重要性极不相称。本文拟依据相关文献资料,采用白描叙事的方法,重建边疆服务的历史,并根据历史本身的因果逻辑,对事件及其派生出来的相关问题作一初步诠释,力图为认知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存在及发展变化,提供一些与人们过去熟知的事实不尽相同的历史信息。

一、“社会福音”思潮与边疆服务的发轫

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传教事业所经历的最大变化莫过于宣教重心的转移。这不仅是教会面临的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因应时代的变化与需求,全世界的基督教会都在经历着由旧时强调吸引异教徒或非教徒使之皈依上帝到教会应成为传播人道主义的媒介之观念转变。这种转变要求教会领袖与时代同调,注重基督福音的精神与物质利益,促进社会的改革与进步。这一重大转变的转折点,是1897年丹尼斯牧师(James S. Dennis)³卷巨著《基督教差会与社会进步:外国差会之社会学研究》一书的问世。该书把差会说成是当时世界社会改革的一大因素,认为外国差会的目的应当是提高人类社会,减轻传统罪恶,介绍改革观念,被热心传教的人士当成有关差会的决定性宣言。

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各国教会组织宣教的“强调重点由个人向社会转移”的同时,中

余牧人:《抗战八年来的中国教会》,《基督教丛刊》第9期,1945年2月,第9—11页。

参见刘吉西等编《四川基督教》,巴蜀书社1992年版;秦和平《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史》,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姚民权、罗伟虹《中国基督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杨学政主编《云南宗教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韩军学《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成先聪、陈廷湘《基督教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以医疗事业为例》,《宗教学研究》2001年第4期。本人于2002年申请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资助,之后几年,曾指导研究生邓杰、汪洪亮从事资料搜集及子课题研究,本文采用了邓、汪二人的部分研究成果。

Jame S. Dennis, *Christian Missions and Social Progres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Foreign Missions* (New York, 1897). 关于该书的评论,参阅 Pual A. Varg, *Missionaries, Chinese and Diploma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ed in 1977), p. 72.

James L. Barton, "The Modern Missionary",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January 1915, p. 6.

国教会也在经历着类似变化。众所周知,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半个世纪,来华传教士由于强调个人信仰的转变,把尽可能多的招揽信徒放在传教工作的首要位置。各个教会组织都大量劝人入教,在各国差会拨给传教团体活动经费时,吸引了多少人进教是决定经费多少的一个重要因素,致使中国信徒在 19 世纪最后 40 余年呈现增长高峰。然而,进入 20 世纪以后,尤其是在 1910 年爱丁堡传教大会后,情况已大大改观。传教士乐灵生(Frank Rawlinson)在论述 20 世纪初中国“教会重点事业的变化”时指出:“宣传福音的方式也有了改变,由单一的直接的宣传变为包括各种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社会问题都用作宣传素材……二十年前是集中宣讲福音时代的结束。如今在各大城市中正在开展各式各样的传教活动。教会除宣传个人得救外,更使得救者背起十字架宣传上帝的救恩。由神学课程的论题中可以看到,教牧人员的社会思想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扩大了对社会和国家的关注。基督教的注意力集中在国家问题上,更加关心国家大事。近十年来,教会在使信徒适应社会的工作方面也有很大进展,用信徒发自内心的力量使社会生活基督化。”

社会福音需要具体的社会改革实践来体现。两度来华布道的美国人艾迪(Sherwood Eddy)表示:“我们必须拯救人生的各个方面,包括其宗教的、经济的、政治的、民族的和国际的关系。”观念的更新使许多传教士不再单靠口头和文字布道,而是将基督教的原则放到现实的社会服务和社会改造中去实践,以此拓展传教事业的广度及在民众中影响的深度。他们强调:“社会服务是基督教精神的现代表达,是福音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服务的理想是实现神国,社会服务的本质就是要用现代生活的词汇来解释神国”;“只有社会服务才能生长出基督教精神,社会工作是福音的一部分,是实现神国的工具”。个人福音工作主要依靠教会组织和传教士的努力,但社会福音却必须依靠社会力量。于是,在社会福音理论指导下的教会开始和当地的官僚、士绅、商人、知识分子等阶层合作,共商社区福利改善,以期对社会生活发生更大的影响。

直接推动边疆服务的机构是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该会是“三自”运动的产物,“三自”是“本色化”的具体体现,因而也可以认为,边疆服务与基督教的“本色运动”有着内在联系。1927 年 10 月,第一届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在上海举行会议,与会的 88 位代表中有 66 位是华人教会领袖,代表了全国 12 个教区和 51 个分区,会友数目超过 12 万,约占全国基督徒的 1/3。会议选举诚静怡为总干事,通过的决议要求会员放弃原有的宗派观念,本着“超越教派,合而为一”的原则,推动自养、自理、自传的本色教会运动,达到中国教会的全体

乐灵生:《近二十年来中国基督教运动的改革与进步(1900—1920)》,司徒敦主编:《中华归主》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01 页。

乐灵生:《近二十年来中国基督教运动的改革与进步(1900—1920)》,司徒敦主编:《中华归主》上册,第 104 页。

艾迪:《中国的社会福音》,转引自刘家锋《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研究(1907—1950)》(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0 年,第 11 页。

Herbert Cressy, “The Practical Value of Social Service as Part of a Missionary Program”, *The Chinese Recorder*, March 1916, pp. 207—208.

John Stewart Burgess, “The Church as a Center of Religious Culture and of Inspiration for Social Welfare”, *The Chinese Recorder*, September 1915, p. 560.

合一。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是当时“在中国政府博得‘法人’地位的唯一教会团体”，它不倡宗派，不分国界，唯求适合中国国情，应付中国的需要，为日后在外患与内战交织的中国社会中广泛参与社会事务奠定了基础。

边疆服务运动缘起于1939年夏诚静怡和总会青年执委张伯怀的贵州、四川之行。旅途中，他们“听见了许多关于边地同胞的消息，也看见了许多边胞生活的情形”，产生了福音传播的使命感和作一次“边疆服务的尝试”的构想，并很快形成“书面的设计”。诚静怡和总会副总干事崔宪详在拜会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时，报告了西南地区的落后情况，同时表达了教会在抗战后方为民众服务的愿望。孔祥熙也是基督教徒，正愁“缺乏贤明官吏和缺乏为政府臂助的民众运动”，教会愿意做“政府的臂助”，去条件艰苦、少有贤能人士前往的边疆地区服务，当然求之不得，慨然支持。孔祥熙后来回顾边疆服务的缘起时说：“对于边疆服务之发生兴趣是在同亡友诚静怡先生谈话中激发起来的”。他在听取了诚静怡的意见之后表示：“为何不发动一番服务边民的事业呢？我向诚先生挑战说。诚先生接受了挑战，立即同张伯怀先生及其他在渝的同道着手设计边疆服务的工作。”

获得孔祥熙认可后，总会遂将边疆服务计划呈报国民政府。呈文于1939年6月14日送达行政院，24日行政院下达院令，对服务计划大为嘉许，不仅迅速批准，还应总会之请，允在3年试办期内给予经费接济。11月6日，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行政部部长周钟岳发布“总字第一四零五二号训令”，同意边疆服务部筹备主任张伯怀的请求，令川康等省政府并转饬所属机关对边疆服务工作予以协助。总会的一份报告称“边疆服务计划自始即获得中央政府之赞助”，可证明中央政府对边疆服务的关注。

由于服务区域主要分布在四川，总会还就边部成立之事向四川省民政厅提出申请，并呈上工作计划大纲，请求协助。与此同时，总会向四川省社会处陈述了总会宗旨及成立经过，“呈请签核备案”。四川省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对边部的行动十分关注，接到行政院训令及边部申请不久，就核准备案，并发出指示，要求“第十五十六区行政各县”协助督导所属，对行政院训令，以“遵照为要”。

各级政府支持边疆服务运动，与抗日战争爆发这一特殊形势有密切关联。如所周知，基督新教早期的社会事业大多集中在沿海、沿江口岸城市，内地农村尤其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鲜有教会同工的足迹。直到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被忘却的“边疆”的重要性才凸

蒋翼振：《诚静怡博士追悼大会》，《田家半月刊》第7卷第2期，1940年1月16日，第11页。

刘龄九：《边疆服务部工作简报》，《总会第五届总议会记录》，上海市档案馆藏档（以下简称“上海档”），U102—0—16，第156页。

《边疆服务委员会第五届年会孔副院长致词》（1943年10月20日），云南省档案馆藏档（以下简称“云南档”），51—4—251。

刘龄九：《边疆服务部工作简报》，《总会第五届总议会记录》，上海档，U102—0—16，第156页。

《总会理事会报告书》，《总会第五届总议会记录》，上海档，U102—0—16，第51—52页。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成立前后经过情形、公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以下简称“四川档”），四川省社会处档案，民186—2—1835。

《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人员名册、工作计划、川西区工作报告、暑期服务团筹备经过》，四川档，四川省民政厅档案，民54—2。

显出来,边疆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因此而受到普遍的关注。改良边政,建设边疆,被视为这一时期与抗战同等重要的大事。“中国已经到了空前的最严重的时期,除了加紧抗战与敌人作殊死的斗争外,应该继之以最实际最必要的工作,然后方有复兴的希望”,而被视为“边疆”的西南地区的开发,“正是抗战期中应该有的最实际而最必要的工作。惟有这样然后可以说到长期抗战,及抗战中可以有种种的补充”。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写到:“只要我全国的青年立定志向,任他人所不敢任的工作,受他人所不能受的痛苦,乃至冒险犯难,进到常人之所不敢到的边疆僻壤,以适应国家社会的需要,而充实国家民族的生命,如此国家社会的改造,亦必易如反掌。”蒋介石本人具有基督教徒身份,他对边疆的关注以及他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对边疆服务的支持,对战时边疆地区的开发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二、边疆服务部的筹设与服务区的开辟

因应抗战救国之需及基督教福音事业的变化,在获得行政院及四川各级行政部门支持的情况下,边部的成立已顺理成章。不料工作正要开展,诚静怡却在当年病故,与诚共谋其事的张伯怀在各方支持下继续诚的未竟事业。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拟订了工作方针和计划,选定了工作人员,筹划了工作经费。1939年10月,张伯怀带领第一批工作人员由重庆前往成都,在华西坝齐鲁大学内成立了边疆服务办事处。同年12月,边疆服务部正式成立,张伯怀担任主任。张的继任者先后为刘龄九、崔德润。

边部作为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的直属机构,对边疆服务运动具有领导职责,其宗旨是:“以基督服务精神,本中央抚圉边民之德意,对边疆民众从事各种服务,藉以启发边民知识,救济边民疾苦,改善边民生活,促进边民团结,充实国家能力。”根据宗旨,边部确定了如下服务原则:(1)从事纯粹宗教团体之活动,“绝无政治及党派关系”;(2)以服务为唯一目的,以基督之爱,行爱人之道;(3)主张民族平等,对于边民不存种族、文化及宗教的自大心理;(4)对于边民固有文化,抱欣赏学习之态度;(5)同工以国文国语为主要工具,但须尽力学习边民方言与文字,藉以明了并赏识其文化与生活;(6)同工须学习注音字母,以便记录本无文字之边民言语,并以之传授边民,教育边民;(7)不限地域籍贯,在全国各地广为征求基本干部;(8)中级干部尽量由接近边民之各省延揽;(9)为造就地方领袖,下级干部优先在边民中设法训练。

边部组织机构分总部和区部两级。总部设主任1人,由总会与边疆服务委员会协商聘任,全面负责边疆服务工作之推进;主任之外,另设会计、秘书、视导干事及文书等职员若干,分掌具体工作。边疆服务采用“服务区”制度,服务区办事处即区部,直属总部,为全区之行政中心,负责统筹区内各项事工。根据实际需要,区部可分设服务处,服务处根据地方需要

姜蕴刚:《边区与抗战》,《边区问题之理论与实际》,西南边政协会1940年版,第13、14页。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星星出版社(出版年不详),转引自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编《边疆服务》第2期,1943年6月,第1页。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工作计划大纲》,四川档,建川50—436;《服务规程及条例细则等》,上海档, U102—027。

可分设服务所。除了固定的“处所”服务,还有不定期的“巡回”服务。

为统筹全局,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设立了边疆服务委员会。委员一般由国民党内信教或与基督教有联系的高级官吏及教会大学的校长等社会知名人士担任。以第一届委员为例。孔祥熙为名誉主任委员,吴贻芳为主任委员,蒋廷黻为副主任委员,陈立廷为会计。因边部计划推动的工作包括宗教、教育、社会、卫生及研究调查等,故相应设立了宗教事工设计委员会主席,由孙恩三担任;教育事工设计委员会主席,由陈裕光担任;社会事工设计委员会主席,由陈钱生担任;卫生事工设计委员会主席,由颜福庆担任;研究调查设计委员会主席,由杭立武担任。每个事工设计委员会设有若干委员。在孔祥熙的支持下,边部创办了《边疆服务》和《边疆服务通讯》两份杂志,前者以介绍边部工作及边地情形为主,后者以传递边部信息,联络同工情感为主。

边部经费来源包括:(1)政府补助:头两年所有经费几乎全靠政府补助,第三年四川、西康两省政府及服务区地方政府略有补助;(2)社会团体资助:包括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美国红十字会、美国援华委员会及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等会之资助;(3)自筹:从第二年开始,边部每年自筹一部分经费,“(民国)三十年度自筹经费约十分之一,三十一年度约五分之一”,以后自筹经费的比例逐年增大;(4)服务部的生产及医疗事工收入。通过多渠道筹集资金,服务工作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服务区的开辟遂提上工作日程。

1939年秋与1940年春,张伯怀深入滇、黔、川、康边地考察,决定先建立川西服务区,而后再谋发展。所谓“川西”系泛指川、康、甘、青交界的边区,是一个方圆千里的高山区域,理番县(今理县)位于区域中心。该区汉藏居民杂处,还有少量羌族和嘉戎族人,喇嘛教为当地民众信仰的主要宗教。早在1930年代初期,中华基督教会四川大会便建议在理番开辟工区,曾派牧师毛树森在理番布道,建造了3处礼拜堂,1处学校,但在1935年兵乱中毁于一旦。边部同工认为“应当尽最大的努力将被拆毁的圣殿再建立起来”,于是决定以川西为第一个服务区。

川西区区部设于威州(今汶川),威州位于理番县境内杂谷河与岷江交汇处,北通茂县松潘,南接懋功靖化,为川西交通咽喉,区部设在这里,便于联络并开展工作。又在杂谷脑设服务处,该地是汉藏交易中心。1940年1月2日全体工作人员从杂谷脑出发,分向各地寻觅工作地点,随即展开调查。这次调查使工作人员初步认识了川西社会之情形,确定了子达寨、日尔觉寨、龙溪沟寨3个分区,联络了民众领袖,影响了当地舆论,为服务工作的开展营

《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人员名册、工作计划、川西区工作报告、暑期服务团筹备经过》,四川档,四川省民政府档案,民54-1-2。

《边疆服务委员会四届年会记录摘要》,《边疆服务》第1期,1943年4月,第21页。

本节有关经费的内容系据以下资料包含的信息综合而成:《边疆服务委员会四届年会记录摘要》(1942年11月4日),《边疆服务》第1期,1943年4月,第21页;崔德润:《国际性救济福利团体调查提纲》(1950年7月),《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登记表、章程、服务规程》,四川档,建川50-435;《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委员会第五届年会会议记录》附《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总部工作报告》,云南档,51-4-251。

刘龄九:《边疆服务部工作简报》,《总会第五届总议会记录》,上海档,U102-0-16,第158页。

《边民宣教近讯》,《总会宣教事工同年公会时刊》,上海档,U102-0-27,第18页。

造了一个适宜的环境。

西康所辖地区战略位置重要,南京国民政府西移不久,正式成立西康省。西康有康属、雅属、宁属之分,后者是当局最感棘手的区域,为彝族(时人称为保保、保罗、夷人等)集中地。当时的彝区经济落后,社会动荡不宁,民族关系紧张。彝人性情强悍,流行“打冤家”,故有“华北的黄河与凉山的夷匪,是中国的两大祸患”的说法。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制定了以“德化”代替征服,以“同化”代替分化,以“进化”代替羸弱的“三化政策”,但收效甚微。到该区域开展服务工作,被认为是“极大胆而极冒险的尝试”。天主教曾在该地布道,但无果而终。1940年5月31日,于道荣、张广文、崔德润离开成都奔赴西昌,借四川浸礼会在西昌的房屋展开工作,奠定了西康区的根基。西康区区部设西昌,以宁属9县为工作范围,以彝胞为服务对象,兼及汉族,先后以于道荣、马鸿纲、李言三、王伯勋、刘焕章为主任。

除立足川西及西康两区外,边部曾致力于在云、贵开辟服务区。1943年3月张伯怀受总会委托访问云、贵两省教会,顺道考察当地服务工作之需要与机会。4月,张伯怀在昆明考察,与云南省教育厅、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及西南边疆语文学学校等机关两度会谈。当地人士很快组成云南边疆服务设计委员会,推选教育厅长龚仲钧为主席,云南中华职业教育社孙起孟及联大社会系陶云达教授为副主席。边部遂以滇北之寻甸为中心,由张宗南负责,开展云南区的服务工作。后以云南距成都太远,人事补充物资供应均感困难,加上张宗南因夫人患病而离开,不得已于1945年将云南区的工作移交云南中华基督教会接办,边部在云南的工作遂告中止。此外,因张伯怀曾在贵州惠水、黄平两县苗区调查,“引起该二处教会工作人员对边民服务工作发生浓厚之兴趣”,又决定向各苗区推进服务工作。1942年夏季毅齐慨捐3万元作为布道及服务之用,边部遣朱邦兴夫妇等前往黄平开展服务工作。

组织机构的设置及服务区的开辟,为边部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从事福音传播、开展社会服务工作奠定了基础。

三、边疆服务事工与边地社会改良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选择“社会福音”发展路向,系顺应世界范围内教会改良趋势之举。然而,离开改造社会的具体实践,“福音”只能是镜花水月,于社会没有裨益。为了将社会福音落在实处,推进边疆服务工作的开展,边部成立伊始便拟定了详尽的工作计划,要求各服务区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生计等方面开展服务工作。各服务区的工作应尽量与中央及地方机关合作,教育事业应统筹兼顾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医药事业应使治疗防疫和

《边疆服务部川西区工作报告》(1940年4月19日),四川档,四川省卫生处档案,中华基督教卷,113—30。

刘龄九:《边疆服务部工作简报》,《总会第五届总会议记录》,上海档,U102—0—16,第18页。

李仕安:《西康宁属概观》,《边疆服务》第11期,1946年9月,第11页。

《边疆服务部西康区三十五年会议记录及总部来信登记》,凉山州档案局藏档,317—35。

《云南成立边疆服务设计委员会》,《边疆服务》第2期,1943年6月,“本部通讯”,第22页;《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工作报告》(1943年),云南档,51—4—251。

《张主任调查贵州苗区》,《边疆服务》第2期,1943年6月,“本部通讯”,第23页。

卫生教育齐头并进,社会事业应立足于救济边民痛苦,改良社会风俗,组织民众团体,化解民族纠纷,宗教工作则应与具体的服务工作同时进行。一切计划周至之后,首批服务人员于1939年12月14日前往四川松理茂汶一带,开始川西区工作,边疆服务自此全面铺开。

(一)文化教育服务

服务区文化教育落后,在边部同工进入之前,几乎没有正规的学堂教育。1940年春,张宗南、张楚望和肖兴汉分别在日尔觉寨、子达寨、佳山寨办起国民小学,前两校学生主要是藏族子弟,后者则是羌族子弟。半年之后,县府到子达寨办学,边部遂与之合作。1943年日尔觉寨小学有学生34名,佳山寨有学生32名,并建有附属幼稚园。萝卜寨小学是应寨民请求,经汶川县委的委托同边部合办的一所小学,但基本上由川西服务区独立支持。打开办学局面之后,当地政府给边部工作以积极支持或邀请前往办学。边部所办日尔觉寨小学和佳山寨小学,自1943年7月起得到理番县府补助。1943年夏县府还请求边部前往办理九子屯、二瓦寨小学,许诺承担全部经费,希望将此处办为示范小学,以作全县教育之倡导。1945年春,崔德润及萧乐儒率领佳山寨小学学生共17人参观成都,受到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等官员和各大学师生的热情接待。从未走出大山的边地儿童看到了“大都市、大学校、大官员”,增长了见识。

除了相对正规的学校教育之外,边部还在川西区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社教工作,包括开办民众学校与民众训练班、巡回施教(报告国事,宣讲卫生,指导农事等)、开设民众图书馆、举办民众教育展览、播放幻灯片及广播等。为启发民智,边部还在杂谷脑、理番城、通化、威州等地张贴壁报,宣传国内外大事及抗战情形,并展览美国新闻处提供的时事照片,产生了一定的教育及宣传效果。

在西康区,边部亦有边民学校两处,一是会理西南的小黑菁小学,一是西昌附近的黄柏菁小学,后者因附近彝民“打冤家”,秩序不宁,被迫停办。小黑菁小学一直维持较好,在校学生一般都维持在30人以上,彝族占绝大多数。1942年学生共36人,其中18人是“黑夷”,11人是“白夷”,4人是“娃子”。年龄最大者为19岁,最小者只有4岁。黑夷与“娃子”语言一样,但后者是前者的奴婢。白夷学生相对勤奋,成绩较好。一些学生毕业后升入会理金江职业学校。1944年3月成立的小高山小学则生源较差,谭秉玺任校长后力谋扩充,改建旧教室,并增建教室两间,开辟校园一所。

西昌是宁属政治文化中心,中、小学较为发达,惟幼稚园太少。西康区部决定开办幼稚园一所,经过积极筹备,西昌惠康幼稚园于1945年3月6日正式开学。当年即有儿童47人

《萝卜寨小学建筑新校舍》,《边疆服务通讯》第1期,1945年3月,第3页。

《川西区工作报告》(1943年),云南档,51—4—251。

《佳山寨学生锦城观光》,《边疆服务通讯》第2期,“最近消息(总部)”,1945年5月,第4页。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卷”(二)(以下简称“文化卷”(二)),江苏古籍出版社(无出版年月),第839页。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文化卷”(二),第843—844页。

入学(男 30 人,女 17 人)。因教员马骥声的努力,办学成绩突出,得到教育部嘉奖。

(二) 生计服务

边地苦寒,生产及生活资源贫乏,边民生计窘迫,因而改善边地社会生活状况使边民摆脱贫困,成为边部同工的急务。一些在内地民众看来极为普通平常的生计措施,在服务区内却往往是作用与意义都非同寻常的变革。

1. 设置毛织习艺所。该所于 1943 年 3 月成立,并向县府备案,以杂谷脑武圣宫后殿为所址,主要训练寨民及营盘街妇女使用木机纺线,暑假又培训威州师范学生,推动纺毛运动。农忙过后改变培训方式,送技术上门,派人轮流到寨上组织妇女训练,采用合作办法,贷以工具及材料,并指导其工作,然后将所纺之线,集中整理洗染,代为运销。

2. 建立畜牧改良场。川西区宜于畜牧,但当地畜牧业并不发达。为提倡畜牧事业,改良旧品种,防治畜疫病,边部于 1945 年成立了畜牧改良场。场址设在威州,由刘国土主持。改良场采用新式牛棚及羊房建筑,引进外国牛、羊品种,用杂交法改良当地家畜,繁殖新的牛、羊品种。

3. 实施麦病防治。1944 年 10 月,刘国土在佳山寨发现小麦线虫病瘿及腥黑粉病,均甚严重,于是走遍威州及杂谷脑附近村寨展开农作物调查。结果不仅确定了各区麦病的发病率,还发现了病害的地域分布情况。据此,刘国土建议政府推行防治,指导农民换种选种,做好试点和推广工作,并筹设服务区中心防治站,以利工作开展。1945 年 10 月,边部在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病虫害防治团及理番、汶川两县府协助下,开始“川西边地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麦病防治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4. 创设示范造林区。川西区造林运动宣传已久,成效无多。1943 年春,边部与农林部岷江流域国有管理处接洽,商定将佳山寨附近荒山划为示范造林区,面积 2 万余亩,分 5 年栽种。培植树苗由林管处负责,动员民力由边部负责。除公有林外,并提倡私人种树,四川第十六行政区专员及理番县府对此项计划极为赞同,并拟推行至全县全区。

5. 开展社会赈济。边地社会秩序不宁,天灾人祸并行,不少家庭因此而破产。在政府赈济款未到的情况下,边部曾垫支部分经费赈济边民,又与当地领袖合作,开设贷款业务。还赞助经费用于地方修桥铺路,组织畜牧合作社及消费合作社,在学生中设立奖学金等。1944 年 10 月,兴文坪因拒绝烟匪通过,全寨被烧光。崔德润、马锡山等人在县府代表陪同下前往兴文坪慰问,向居民分发衣物,鼓励他们更加积极地协助政府禁烟。总部在成都也广为募捐,将筹集到的 13 万元捐款用于救助灾民。

《幼稚园筹备就绪》,《边疆服务通讯》第 1 期,1945 年 3 月,第 6 页;《惠康幼稚园开班》,《边疆服务通讯》第 2 期,1945 年 5 月,第 10 页;《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文化卷”(二),第 844 页。

《川西区工作报告》(1943 年),云南档,51—4—251。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文化卷”(二),第 842—843 页。

刘国土:《四川十六区麦病调查报告》,《边疆服务》第 20 期,1947 年 8 月,第 3—29 页。

《防麦病巧夺天工》,《边疆服务通讯》第 4 期,1945 年 11 月,“川西消息”,第 6 页;《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文化卷”(二),第 843 页。

《川西区工作报告》(1943 年),云南档,51—4—251。

《兴文坪赈灾——节录崔主任报告》,《边疆服务通讯》第 1 期,1945 年 3 月,第 5 页。

(三) 医疗卫生服务

医药卫生工作是边部服务事业的重要内容。《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工作计划大纲》要求“治疗防疫与卫生教育同时并进”，强调“本部工作拟采用服务区制度，以便因地制宜，使工作人员有充分自由与试办之机会，区内之卫生教育各项事工须统筹兼顾……每区设卫生干事数人，担任区内医疗、防疫、卫生教育与卫生运动之责。”按照大纲要求，边部还制定了详细的《卫生事工方案》。1943年1月1日，边部在成都召开事工检讨会，对服务区医疗卫生工作作了精细的计划和安排。

根据工作计划，边部在每个服务区都设有医院或诊所。如川西区开办了威州诊所、理番协立医院、杂谷脑医院（诊所）、初级护训班；西康区开办了西昌中心医院、河西诊所、罗家场诊所、四开诊所、德昌诊所、普威诊所、助产训练班。各医院诊所都聘有专门的医务人员，包括经验丰富的医生和训练有素的卫生助理干事，开展了艰巨而又卓有成效的医疗卫生服务工作。

以川西区威州医院为例。从创建开始，该院便开展了多方面的医疗卫生服务工作。首先是门诊治疗。威州为进出十六区必经之地，故该处门诊工作至为繁忙。门诊治疗的病种除常见疾病外，主要有痢疾、黑热病、回归热、梅毒、淋病。1944年，该院诊治的这5类病人的数量为144人，种牛痘207人，预防注射135人，手术323人次，作其他项目检查者117次。到威州医院门诊的病人主要为汉人和彝人，但无论是初诊还是复诊，汉人均比彝人多。原因在于交通不便及边胞对现代医药缺乏信任。复诊人数一直多于初诊人数，说明病人一旦接触西医，便对之产生了信任。除给就诊病人诊治疾病外，医院还兼作卫生保健工作，包括给边胞做健康检查、接种疫苗和其他防疫注射等。针对当地出生婴儿死亡率高的状况，边部还设立了妇婴卫生专科。这在当地是一个突破。为提高边胞的卫生常识，边部工作人员还不辞辛苦地找边胞进行个人谈话，或到边胞家中探访，扩大了医院的社会影响。1946年3月19日，四川省第十六区专员何本初到医院参观，“惊羡医院设备之完善，誉为‘川西第一’，对于医生之服务精神更加赞扬不置，后赠以‘百家生佛’四字”。边部医疗卫生工作的成绩，由此可以概见。

由于服务区位于边地山区，交通及信息不便，多数居民都散居在“亭台六七座，烟村四五家”的山寨里，固定的医院诊所无法解决边民面临的全部问题，边民缺医少药。在这种情况下，巡回医疗成为边部医疗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川西区的巡回医疗卫生工作最初是由总部组织大学生暑期服务团前往，后来则由崔德润就地组织小团体开展。服务区的卫生机构，无论医院或诊所，“每逢礼拜日都要到临近的寨子上巡回施诊，以资便利高山上无力就医之病胞们”。通过巡回，边部声名远播。刘龄九在一份工作简报中写道：“这广大区域已经

《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人员名册、工作计划、川西区工作报告、暑期服务团筹备经过》，四川档，四川省民政厅档案，民54—2；刘龄九：《关于工作检讨的几点概括意见》，《边疆服务》第4期，1943年11月，第23页。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川西区威州医院诊所医疗月报表》（制表人：马锡山；时间：1944年12月25日），阿坝州档案馆藏档，4—31。

《威州医院新气象》，《边疆服务通讯》第6期，1946年4月，“川西新闻”，第6页。

边锡龄：《巡回诊疗记》，《边疆服务》复刊第1期，1950年3月，第21—22页。

没有不知道本部工作的人士。过去对外人极不欢迎的黑水流域和西土地区,倒是特别派人来请我们派人去工作了。”

(四) 宣教事工

对于宗教团体而言,宣教可说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边部《宗旨》明确宣示:“本部是以宗教的精神从事服务的工作”,“以教会立场办理社会事业”。边部正是遵循这一宗旨,在边地开展服务工作的。

以川西区为例。川西区羌、藏、汉各族混居,信仰状况复杂。羌人没有专一虔诚的信仰,没有专职僧侣,也没有强大的宗教组织。在羌族地区传教,不易受到有组织的抗拒。藏区传教则相对困难,原因在于藏区喇嘛教势力强大,组织严密,对外来宗教比较排斥;藏人宗教兴趣浓厚,优秀青年多到寺院当学徒,宣教工作展开不易。川西北藏区属安多藏区,与青海西藏并为喇嘛教的“势力范围”。边部服务的杂谷脑等地处于藏区东极,当地的嘉戎族是藏人中最接近内地文化的一支,宗教信仰相对青藏自由,边部遂将此地作为“送福音进西藏的阶梯”。至于汉人,一般住在沿交通要道的地方,除少数公务员外,大半是客居商民和来自各地的靠接送过往商贩为生的抬滑竿者。针对边地烟赌恶习盛行,民众精神生活贫乏的现状,边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教工作。

威州是川西区宣教工作的重点区域,该地原有福音堂一所,后毁于地震,工作停顿。边部同工来此工作后,定期在区部办公处举行礼拜活动,由崔毓珊及宗教干事邵云亭轮流负责。邵调往萝卜寨后,每月仍继续来镇主持礼拜一次,其余时间由崔及卫生干事负责。邵云亭在萝卜寨的宣教工作主要采取个别谈话、小组讨论、家庭访问等方式进行,奠定了较稳定的福音传播基础。理番城中原有福音堂及女子小学一处,后被毁,边部1940年10月在此设立医院后,开始恢复礼拜,每周轮流在各教友家中举行,由卫生干事马锡山负责领导。杂谷脑的宣教工作由耿笃斋牧师负责,耿于1940年3月初到杂谷脑开展传教工作,是边部聘请到川西区的第一位宣教师。他到杂谷脑布道的第一年即有10人受洗,其中一位黑水妇女原来信喇嘛教,查经班也常有青年喇嘛出席。随着信徒的增加,礼拜聚会场所不敷使用,在总会与四川分会的协助下,杂谷脑于1942年春完成福音堂的建设,为传教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创造了条件。

西康区宗教工作成绩不如川西区显著,不过该区的宗教活动却十分活跃。西昌城里的教会在冯葆光、朱晨声、刘凤鸾、张国入、恩约翰领导下,谋取自立、自养,取得了一些进步。为扩大传教事业的基础,1946年曾筹备西昌教会宗教事工人员训练班,拟于当地信徒中,甄选合宜人员予以短期调练,以造就教会干部。为加强宗教精神及训练音乐常识,西昌还组成圣乐队,定期练习,每逢圣日均有特别唱诗。还利用暑假开办义工宗教讲习会,讲授圣道研

刘龄九:《边疆服务部工作简报》,《总会第五届总议会记录》,上海档,U102-0-16,第160页。

张伯怀:《本部的回顾与瞻望》(事工检讨会闭会词),《边疆服务》第4期,1943年11月,第5页。

边部认为,在藏区传教只能做“滴水穿石”的工夫,“这不是几个年代的事业,必须准备几个世纪的工夫。”引文见刘龄九《边疆服务部工作简报》,《总会第五届总议会记录》,上海档,U102-0-16,第164页。

《川西区工作报告》(1943年),云南档,51-4-251。

《川西杂谷脑福音堂举行献堂典礼》,《田家半月刊》第9卷第19-20期合刊,1942年10月,第11页。

究、卫生须知、农业常识、乡村教育等。1947年7月,西康区部公推乔普济牧师为宗教组主持干事,领导康区宗教工作,并建议总部组织文字布道社,以藉文字宣扬圣道及各同工互相交换宗教经验为宗旨。西昌青年团契活动丰富,吸引了众多边民参与。

边地传教的最大障碍是传统巫术在边民中的影响。边民普遍具有强烈的“巫术崇拜的意念”,这种意念“在新旧生活之间筑成了一道藩篱”。边部同工发现,若想获得边民对基督教的崇拜,必须首先尊重边民习俗,满足他们的宗教需求,帮他们去除巫术崇拜。为此,他们或是“大刀阔斧般直接地向他们灌输真理”,或是“采用启发式”的诱导。与边民交谈时,“都从他们一般的需要出发……不是把他们的信仰对象铲除净尽”,而是“把他从巫术崇拜转移到至高无上的上帝来”。边部同工及牧师感觉到,在边传教边服务的过程中,边民“很接近道理”。一些边民接受洗礼,皈依耶稣基督。

四、边疆服务与边疆研究之复兴

边疆研究并不始自边部同工,清季以来它一直是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边疆一旦告急或受到当局重视,边疆研究就会成为热门学科。抗战时期的边疆研究尤其是西南边疆研究,“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恰然相反,呈现一种空前的热烈与紧张”。当时政府西迁,国家经济、文化的中心转至西南,学者名流,荟萃于斯。因应时事之需,众多学人开始投入精力研究边疆问题。边疆研究机构、边疆研究期刊也大量涌现,政府或社会团体均组织了不少边疆考察和研究活动。张伯怀说:“抗战以来我政府对边地民众关怀日切,八中全会中央各院部会均在积极推行种种善政,向边地民众宣达中央德意。各地学术专家亦在响应政府倡导,从事边疆问题之研究。本部于二十八年成立时国内之边疆团体尚属绝无仅有。最近已遍地皆是矣。”

边疆研究的复兴与中国基督教徒在边疆研究问题上的反省尚存在一定的关系。此前教会并非完全漠视边疆,但人们看到的基本上是外国传教士的相关活动。外国传教士往往在中国边疆地区一呆数年数十年,而中国宣教师和信徒对边疆却很少问津。边疆研究也存在同样的状况,“我们认为蛮荒不可踏足的地区,外国的学者和探险家却认为是学术研究上的宝地”。边部反省说:“试问我们自己:究竟有多少学人深入边疆埋头研究自己的边疆?究竟有多少专家能真正了解本国边疆的实在情形?国外的探险没有中国人,还可以科学落后为说词;国内的考察仍然藉重于外人,我们将何以自解?难道说中国人真的是只有党派之斗争,只有利禄之角逐吗?”李安宅也说:“我们向来对于边疆的注意太少,为了补偏救弊计,非特别研究边疆不可”,以前对边疆的认识多是“误解”或“偏见”,连外国人对中国边疆的研究都走在中国人的前面,应趁着抗战建国的特殊局面,在边疆研究方面“迎头赶上”。

王禾章:《昭觉之行》,《边疆服务》第27期,1948年11—12月,第8—9页。

马长寿:《十年来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边疆通讯》第4卷第4期,1947年4月,第1页。

张伯怀:《服务运动之重要》,《边疆服务》第2期,1943年6月,第1页。

《几点感想》,《边疆服务》第16期,1947年4月,第2页。

李安宅:《实地研究与边疆》,《边疆通讯》第1卷第1期,1942年11月,第1页。

基于这一认识,《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工作计划大纲》明确将边疆研究确定为边部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列出专章对“边疆研究方案”进行讨论,并规定了研究的目的、组织研究的机关及研究的经费等事项:“(1)为求服务事工之合理化,科学化而得到最大效能起见,本部须从事边疆调查与研究; (2)调查与研究,应由本部与学术机关联合办理之,以便得到专门人才之贡献; (3)研究所之经费应由本部与合作之学术文化机关共同担负之。本部应担负额数由委员会规定之。”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委员会还设立了“研究调查设计委员会”。第一届委员由杭立武任研究调查设计委员会主席,委员由顾颉刚、杨道之、刘枢铭、张肖梅等人组成。

“边疆研究”领域宽广,举凡边地各方面之情况,包括社会、民俗、宗教、神话传说、语言、自然资源等,均可纳入其范围。与纯粹的学术研究不太相同的是,边疆服务运动中的“边疆研究”更加注重“实用”。这样的研究不仅可与边疆服务形成良性互动,而且也给政府当局及国人认识边疆和边民提供了便利。

边部从事的边疆研究包括以下具体研究项目:

(一)民族文化与宗教研究。对边地民族文化与宗教做调查研究是认识边地的基本途径,边部同工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葛维汉博士(David Crockett Gaham)一直致力于羌族宗教的研究。葛氏为华西大学教授、华大博物馆的首创者。1941年夏葛氏曾随学生服务团至川西区参观,对边部工作极为赞许,加入边部为特约研究员,做羌民礼俗宗教之研究。次年夏去川西搜罗材料,著成《羌民习俗》一书,对羌族宗教特别是敬神仪式做了细致描述。1943年5月15日,在既有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边部与华西大学博物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在华西大学联合举办羌民文化演讲会与展览会。展览内容分羌区风光、羌地古物、羌民宗教、羌民生活4组,每组除实物外还有照片与彩色速写数幅至数十幅,展会期间葛维汉作了有关羌民习俗的演讲。傅兹嘉教授在宁属开展的保保经典与神话研究也颇著成效。傅为北大毕业生,学术造诣甚深,对保保文化研究有年,所做调查研究对于认识当地民族宗教与文化习俗具有参考价值。

在研究过程中,边部注重对团队成员进行专业培训。1945年,张伯怀领导凉山抗建服务团“深入宁属各县,作普遍的宣传调查与研究”。在正式组队出发前,服务团在华西坝进行为期1周的短期培训,邀请国内边疆问题学者如李安宅、徐益棠、柯象峰、刘恩兰、马长寿、林耀华、冯汉骥、蒋旨昂等为训练导师,讲授宁属地理、历史、经济、保民社会组织和边疆社会工作等课目。3月10日训练班结束,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及西昌委员长行辕主任张伯常到会训话,华西坝各大学校长及关心边疆问题的社会学教授20余人出席。培训班的举办,对服务团成员研究水平的提高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人员名册、工作计划、川西区工作报告、暑期服务团筹备经过》,四川档,四川省民政厅档案,民54—1—2。

《葛维汉边疆研究兴趣浓》,见《总部三十一年度大事记》,《边疆服务》第1期,1943年4月,第20页。

《本部与二团体联合举办羌民文化展览》,《边疆服务》第2期,1943年6月,“本部通讯”,第23页。

《组织凉山服务团》,《边疆服务通讯》第1期,1945年3月,第3页。

《凉山服务团出发前后》,《边疆服务通讯》第2期,1945年5月,“最近消息(总部)”,第2—3页。

(二)民族语言及社会历史研究。边部同工极为重视民族语言及历史的研究,其研究活动及成果主要有:1942年,英国庚子赔款委员会语言学研究员金鹏受边部委派前往川西区理番杂谷脑研究嘉戎语言,历时1年。其间金鹏搜集了大量材料,编成《戎语会话》一书,以国语注音符号与国际音标译音,并整理嘉戎语汇与嘉戎语语法,编成《嘉戎语字典》一本。1944年9月,边部委派阮怀昫女士前往服务区继续研究。阮特意选择嘉戎领袖杨绳武家居住,通过协助办理该村小学,学习研究当地语言。金、阮二人的研究为认识作为藏族重要一支的嘉戎族的语言及其种族归属提供了依据,并在服务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康服务区的边部同工也很重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曾邀请华中大学中文系主任傅兹嘉教授在宁属地区研究彝族的经典与神话。西康服务区成立了夷语研究班,区部工作人员全体参加;聘请彝族人诺尔乌滋作彝文翻译;与黄裔编写彝族民众教材,与王朝清译《夷人格言》,与吴慰曾编译《夷汉文字典》;还编辑《汉夷旬报》,既作教材又作宣传材料。华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荣宗1938年曾深入贵州苗区考察苗民社会,著有《苗氏社会》一书,曾应边部之邀发表边疆研究的成果。他的《苗族考》和《汉苗源流考证》两文提出了汉、苗同祖同源的见解。其《苗族之语言》一文则从语言的角度研究了苗族与汉族的关系,并对汉苗同祖的观点作了进一步论证。此外,傅正达的《宁属土司起源的故事》、范文海的《牟托温土司》、张征东的《僮僮宗族之人类来源传说》等,对边地民俗文化及社会历史做了调查研究。

通过各大学社会学系相关学者的合作,社会学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边部一份工作报告指出:“自边疆服务开始工作以后,成都各大学研究边疆问题之学者,咸认为边部工作区实为理想之边疆问题场所。因藉服务工作同边胞发生关系后,对材料之收集,问题之调查可能事半功倍。故各大学均曾先后同本部商洽合作办法。本部亦深感在边地工作之同仁,若能在实际服务之暇致力于学术研究,必能在工作与生活更感兴趣。因此本年度即同左列团体商定具体合作办法: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之合作——这是广泛的研究,详细办法拟有计划草案。金陵神学院之合作——该院对本部工作最为关切,本年度除已慨捐萝卜寨服务所四千元做工作实验费外,并商定合作研究僮僮宗教。各大学社会学系之合作:成都基督教五大学(华西、齐大、金大、金女大、燕大)之社会学系,均颇注意对边疆问题作系统的调查与研究。”

(三)地方疾病调查研究。边部多次组织医疗专家对服务区特种疾病进行调查研究。1943年夏,边部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主持齐鲁大学病理系已20余载的齐鲁大学医学院病理系主任侯宝璋亲往川西区境内,协助边部卫生人员调查边民的食道疾病。侯宝璋曾在住

《川西区三十一年大事记》,《边疆服务》第1期,1943年4月,第22页。

《戎语研究》,《边疆服务通讯》第1期,1945年3月,第2页。

《积极研究夷语》,《边疆服务通讯》第1期,1945年3月,第7页。

《苗族之语言》,《边疆服务》第12期,1946年12月,第5—9页。

傅正达:《宁属土司起源的故事》,《边疆服务》第12期,1946年12月,第10—14页;范文海:《牟托温土司》,《边疆服务》第16期,1947年4月,第13—14页;张征东:《僮僮宗族之人类来源传说》,《边疆服务》第24期,1948年6月,第3—4页。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总部工作报告》(1943年),云南档,51—4—251。

山寨为边民进行健康检查,检查结果证明全寨人都有蛔虫病,边部遂根据检查结果对之普遍施以诊治。1944年,边部“为促使边胞普遍注意卫生起见”,组织两个医药考察队赴川西区,“一面宣传,一面举行普遍检查”。第一队由侯宝璋及医师孙绍廉带领,于7月底到达川西区,偕同边部医疗人员,研究黑热病分布情形并沿路调查一般疾病状况,于9月初返回。第二队由华西大学眼科主任陈耀真博士及医师汤佩青带领,9月初到达川西区,偕同边部工作人员调查边地眼病情况,于9月底返蓉。

侯宝璋教授根据他对川西汶川、茂县、理番一带的医学调查,写成《汶川、理番一带最常见的几种病症》一文,对汶川、理番一带最常见的几种病症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各种病症产生的原因及简单的治疗措施。侯氏指出,汶川、理番一带最常见的病症主要有以下几种:(1)肠寄生虫病;(2)回归热;(3)黑热病;(4)泻肚和痢疾;(5)营养不良。其中黑热病的发现,对川西边胞的健康有着重要影响。该病“曾吞噬了无法计算的边童”,发现该病并采取相应的诊治措施,拯救了大量边民的生命,“在川西卫生工作上,实具有重大的意义”。

西康宁属最常见的疾病是甲状腺肿。张伯怀到该区视察工作时发现,河溪镇“一千五百人中无此病者不满二百”。根据在当地接触到的大量病例,边部同工对甲状腺肿的分布情况、病症及治疗手段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张子龄在《边疆服务》第7期上发表论文指出,甲状腺肿在宁属分布区域极广,“北至泸沽,南至金沙江,患者极众,其中城区较乡间为少,贫者较富者为多,女子较男子为众,较重的地方约占人口百分之八十。”1944年儿童节时,张子龄参加检查西昌各学校12岁以下的儿童共计1085人,发现40%的儿童患有此病。“患者且间杂克汀病,粘液水肿病,及聋,哑,呆,痴,神经衰弱,心脏衰弱等症,其影响于体智之发展,至深且巨”。张对宁属甲状腺肿病普遍的原因,甲状腺肿的预防、治疗及“碘化食盐”的制法与注意事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有价值的防治建议。王伯勋任西康区主任后,对该区的“甲状腺肿”做了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于1948年写就《西康区加碘食盐计划书》,作为西康区的工作报告呈递总部,希冀总部能批准在西康区建成一个大的碘盐场,以解决边地患者的痛苦。

(四)边政及边疆问题研究。边政问题直接涉及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民族政策及边地治理,因而备受边部同工关注。通过深入少数民族地区作实地调查,结合实证的历史研究,边部同工完成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调研报告和论文。其中崔德润的《理番县的边务问题》一文对于改良边政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崔德润在考察中发现,理番县辖三番、四土、五屯、六里、九枯、十寨,但真正存在边务问题的惟有“四土”,即梭磨、卓克基、松岡、党坝四土司所辖之地,其面积人口均占理番大半。四土之中,卓克基、党坝因统治权已确定,对内相安无事,对外亦无野心,故四土问题关键在梭磨与松岡。两处地广民众,土司无合法承继人,附近土司遂生觊觎之念,争端迭起。他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解决边务,不能尽靠兵力,最根本的还是

《调查特种疾病》,《边疆服务》第4期,1943年11月,“本部近讯(川西区近讯)”,第19页。

《调查川西区重要疾病》,《边疆服务通讯》第1期,1945年3月,“工作简讯(总部)”,第2页。

马锡山:《黑热病的发现及治疗经过》,《边疆服务》第7期,1944年12月,第12—15页。

张伯怀:《河溪镇》,《边疆服务》第9期,1945年10月,第30—32页。

《边疆服务》复刊第1期,1950年3月,第29—30页。

“发展交通,从事教育文化经济的建设,提高文化水准,改善人民生活,加强政治训练,使边民变成现代的中国国民,使边地变成真正的中国领土”。

崔德润 1946 年曾随理番县长徐均良去黑水三番视察,徐是为禁烟,而崔则是要了解黑水三番之真相,满足其实地考察此地的“夙愿”。行前,他认真研读了有关黑水三番的各种文献,详细翻阅该区域的地图,并准备了演讲材料和新闻照片,以便开展教育及服务工作。在一个多月的旅行途中,崔德润会见边地领袖,观察边民生活,发现许多问题:一是黑水三番数千户人家,竟无一所学校,距县城不过 200 里,竟不通汉语。二是烟害严重,传统的禁烟办法,无济于事。三是交通隔绝,信息闭塞,边地普通居民竟不知身在民国,自认清朝臣民,见有高级官员,口称“钦差大爷”,高呼“皇上万岁”。四是三番人性情驯良,常受黑水人欺压,加上吸食鸦片,不讲卫生,人口减少。崔德润认为,交通困难是三番问题的症结所在,其他问题都与交通有关。“为政之道,在制先机”,主张采取措施,发展交通和教育,提高边民的经济文化水准,改善生活,加强政治训练,从根本上解决边政问题。

由于边部从事的研究是多学科多领域的,取向是学术研究与服务的有机结合,研究者又大多是学养深厚、注重实践的学者,因而研究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不仅产生了大批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如其所愿配合了边疆服务运动的开展。比如,民族语言与文化的研究在边部与边民之间搭建了沟通的桥梁;地方宗教及习俗调查研究为边部开展福音传播提供了操作方式选择的判断依据;地方特殊疾病的调查研究为疾病防治提供了病理及药理的基础;边政边务的调查研究则为边部也为各级政府提供了处理与边疆少数民族关系的历史及现实的参考。边疆研究受到当时学界的广泛关注与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是十分自然的。

五、时局变化与边疆服务运动的终结

边疆服务运动历时 16 年,经历了两次重大的时事变迁:一次是抗战胜利后国内形势呈现与战时迥异的境况,一次是 1949 年以后中国的政局鼎革。两次重大的时局变化都对边疆服务产生了重大影响,迫使教会方面采取措施,以为因应。

1944 年,当抗战初露胜利曙光,基督教人士就开始了战后重建教会事业的构想。罗运炎认为,战后中国应“是一个独立自由平等的国家”,中国所需要的“是有能力医治精神创伤的教会,有能力改革人心转移风气的教会,有能力主持正义抵抗强权的教会,有能力推动民族解决,民权伸张,民生康乐主义的教会”。为发挥教会的作用,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在战后的首要工作是“复员”。“复员”乃恢复从前之谓,然而在实践层面,“复员”几乎成了“告别边疆”的同义语。边疆服务运动是抗战时期“边疆”成为“民族复兴基地”而广受社会关注这一特定时代的产物,因战时后方肩负复兴重任,故被当局倚重;战后,在江浙起家的蒋介石政权视线东移,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无足轻重,一度成为国人言说中心的“边疆”自然重新恢复

崔德润:《理番县的边务问题》,《边疆服务》第 15 期,1947 年 3 月,第 3—4 页。

崔德润:《黑水三番旅行记》,《边疆服务》第 17 期,1947 年 5 月,第 17—18 页。

罗运炎:《战后的中国基督教会》,《基督教丛刊》第 11 期,1945 年 10 月 1 日,第 3—4 页。

战前的边缘地位。

战后“边疆”地位回落,无疑将对边疆服务运动产生不利影响。对于国民党政府来说,当务之急已经不是“攘外”而是“安内”,以实现国家“统一”的大业。战争结束后,边地的“安全”已不具备优势,而条件的艰苦、信息的闭塞再次凸显,适足成为战时流亡边区者回返内地的理由和内地人前往边疆的拦路虎。李安宅写道,边疆工作“这许多年稍有雏形的发展,不能不说是抗战建国的迫力所给的赐予”;但在战后,“无可讳言的,不但没有汹涌澎湃的趋势,反有回潮下降的危险了”。齐鲁大学的孙家俭写给边部的一封信,描述了“边疆”地位的变化过程:“抗战期中,沿海各省相继失守,逼得政府西迁,几百年被人们忘掉的边地和边胞,开始被政府注意起来,一时开发边疆的调子,唱得非常响亮!开发边地的人们也风起云涌。曾几何时,抗战胜利了,随着时间的增长,‘开发边疆’似乎又开始被人们忘记了,尤其是我们的当局,好像再也未曾提出这个口号了!”

尽管战后边疆地位被逐渐边缘化,但边部同工不改初衷,且有扩充工作范围的想法。张伯怀在1945年8月15日从重庆给各区同工写信,表达了“再接再厉”的决心:“查我服务部诞生于抗战方酣之际,工作于生活最困难之区,六年以来诸同仁在极度艰窘的情况之下,从事于牺牲冒险的事业之中,栉风沐雪,出瘴入瘴,视边荒为乡里,化蛮夷为同胞,国家德意由此深入边区,基督福音由此表彰四夷,此志此功,可敬可佩。今者胜利已临,建国开始,更当本此初衷,再接再厉,总部同人正在商筹经费,充实设备,增辟工区,添聘同工,务使边地同胞同沾化雨,共臻繁荣,无论总会何时复员,我部工作必继续扩充也。”边部在1946年初曾透露其5年内欲达之“愿望”:在滇西设立服务区,以保山为中心;在青海设立服务区,以玉树为中心;在西康关外设立服务区,以巴安为中心;在松潘草地阿坝附近设立大牧场一所;完成凉山彝区工作网,期能协助解决西康“夷患”。

然而,这一愿望始终未曾付诸实践。这年年底,边部开始务实地强调做好现有工作而不轻言拓展。1946年12月张伯怀表示:“虽然台湾在期待着我们去工作,海南需要我们帮忙,伟大的西北不时向我们发着呼声,我们也时刻在准备着往这些区域推动,我们眼前仍然是以巩固现有工作为第一要务。”与抗战刚胜利时所宣称的“无论总会何时复员,我部工作必继续扩充”的豪言壮语相比较,已明显趋向务实甚至保守。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抗战胜利之后几年内的边疆服务工作没有大的进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如何因应形势,再次成为中国基督教团体无法回避的严峻问题。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总干事崔宪详说:“新时代来得太快,使中国基督教的人士,无所

《新春感言》,《边疆服务通讯》第5期,1946年2月,第1—2页。

李安宅:《胜利与边疆工作》,《边疆服务》第10期,1946年4月,第2—3页。

《孙家俭同学来信》,《边疆服务》第17期,1947年5月,第29页。

《致各区同工的信》,《边疆服务通讯》第3期,1945年9月,第1页。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边疆服务部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文化卷”(二),第852—853页。

张伯怀:《胜利后第一年的回顾与前瞻》,《边疆服务》第12期,1946年12月,第31页。

《致各区同工的信》,《边疆服务通讯》第3期,1945年9月,第1页。

措手”,但又“不能不起来迎接、善用并把握新时代”。边部主任崔德润也表示:“大时代来了,一切都要经过一番严重的考验。凡能适应这个时代的,就要生存发展,发扬光大;经不起这个考验的,就要如草木禾秸的建筑,遇到水火同归于尽。”但究竟怎样才能适应时代需要,为基督教的生存发展拓展空间,教内人士并无明确认知。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为惊魂未定的基督教会打了一针“镇静剂”。吴耀宗说,过去基督教会对新时代有怀疑、观望、惧怕的态度,现在“比较放心一点了”,因为“在共同纲领中已明文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尤其是在新民主主义下,共产党以外的各民主党派与宗教界等,都包括在统一战线之内”。年底由人民政协基督教代表和全国基督教协进会、青年会、女青年会组成的联合访问团,到各地进行访问。崔宪详也参与其中并同吴耀宗等人一道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周恩来强调“基督教最大的问题,是它同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要求中国教会“必须肃清其内部的帝国主义的影响与力量”;同时阐释了党的宗教政策,指出宗教存在必将是长期的,唯物论和唯心论在政治上是合作的,应该相互尊重。作为国家领导人,周阐释的意见,使包括边部领袖在内的教内人士喜忧参半:喜则政府允许宗教继续生存;忧则确曾与“帝国主义”有着难解难分的历史渊源,不知如何了断。

1950年下半年,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关系恶化。美国政府冻结了中国在美财产,依靠美国津贴维持工作的教会学校、医院及救济事业受到沉重打击。中国立即采取相应措施加以对付。12月,政务院通过副总理郭沫若《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关及宗教团体方针的报告与决定》,同时颁发《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条例》,要求有关机关、团体依法向政府登记,并报告其工作及经济(资金津贴来源及使用)情况。1951年4月,“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在京召开,讨论通过了经费及财产“处理办法”。该办法于7月24日由政务院颁布,其中第3条规定:“已经实行自养之基督教会团体原来所办之社会服务事业如医疗机关福利机关等其经费能自给者,可继续办理,但须组织董事会,保证其实行政府法令,董事会名单应由政府批准。”中央政府的决策,切断了中国基督教团体与外国“帝国主义”的经济联系,迫使中国教会完全依照“三自”原则,去寻求生存及未来的发展。

边疆服务运动处此社会巨变时期,不能不发生相应的变化。

1951年3月,边部向当地政府注册登记,明确其工作性质为社会服务,承认曾接受中央赈济委员会、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美国援华委员会及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等国内外组织及机构的资助;自1950年起,常经费系由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补助2/3,边部自筹1/3;

崔宪详讲,何慈洪笔记:《基督教与新时代》,《真理与生命》第15卷第1期,1950年3月,第69页。

崔德润:《致本部同工的一封信》(1950年1月12日),《边疆服务》复刊第1期,1950年3月,第35页。

吴耀宗讲,何慈洪笔记:《基督教与新时代》,《真理与生命》第15卷第1期,1950年3月,第67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0—182页。

《对于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处理办法》(1951年7月24日政务院公布),重庆市档案馆藏档,1049—1—

1951年总会补助一半,自筹一半。此后边部按照政府要求,不断填写各种登记表,定期向政府汇报工作情况。按照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通过的处理办法,边部将1948年底成立的辅导委员会改为董事会,以示经济上之“独立”。

除了从经济上与外国切断联系,边部同工还尽其所能,在思想认识上适应时代需要。崔宪详在1949年底写给崔德润及边部全体工作人员的信中强调:“吾人当此新时代中,一方面应虚心学习,随时检讨,以期能多为人民大众服务。”^①1950年1月12日,崔德润致信边部同工,要求他们在思想上“从头检讨,努力革新”;“对于新民主主义与中央政府所规定的民族政策,政协纲领等,尤须从速研讨,以免与时代脱节。”^②为跟上时代步伐,边部号召全体同工共同努力,各尽所能,做好以下四方面的工作:一是“简约救灾”,“每人能捐薪半月,救济灾胞”;二是“尽力买公债”,“至少我们这半年来要挤出半个月的生活费买公债”;三是“加紧开荒生产”,“更进一步地领导和鼓励边地的同胞大力开荒,扩大生产面积与生产范围”;四是“密切同政府合作”,“政府的工作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一定要诚心诚意地在政府的领导之下同政府的工作人员密切地携起手来”。

思想改造很快落实到了三自运动、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政府发起或倡导的活动中。以西昌教会为例。该教会于1950年11月在革新宣言上全体签名,12月底以前结束外国工作人员之工作,自1951年1月1日起停止其到办公室。西昌教会还注重员工的政治与时事学习,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宣传。自1951年起,每周有5次学习,政府也常派人参加指导。1951年4月29日,西昌宗教界在西昌教会礼拜堂举行时事座谈会,会场上方挂着国旗,下有毛、朱、刘、周的4副巨像,四周贴满标语,吴景、王伯勋等20多人起来控诉美日“罪行”,有的甚至声泪俱下。会上还组织了西昌宗教界革新联谊会,制定了西昌宗教界爱国公约。从1952年开始,每周六个晚上都要学习政治,每周一、三、五晚上及星期日礼拜完毕,全体教徒还要学习反对美帝细菌战、新婚姻法、禁烟禁毒及保卫世界和平等方面的文件。

与此同时,边部还对服务工作提出新的要求:教育方面,要在政府领导下办好学校,并做好学校所在地的扫除文盲工作。医药方面,要做到有病得医,甚至送医上门,并在各卫生机构所在地,普遍防疫,宣传卫生常识。生计方面,要详细调查研究,做到真正能帮助边胞增加生产,改善生活。至于宗教工作,则只字未提。这或许表明此时教会和边部的工作重心已发生转移,宣教工作已是“不合时宜”。《川西区一九四九年工作报告》也只字未言宗教工作。虽然王贯三在川西区1950年工作计划中提到宗教工作,但也强调目的在于“破除迷信”,并

①《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表》(崔德润填写,1951年3月),四川档,四川省宗教事务处档案,建川50—435。

②《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1952年度第一次书面报告》,四川档,建川50—436。

③《总会的慰问信》,《边疆服务》复刊第1期,1950年3月,第33页。

④崔德润:《致本部同工的一封信》,《边疆服务》复刊第1期,1950年3月,第34—35页。

⑤编者:《各尽所能》,《边疆服务》复刊第2期,1950年5月,第2—3页。

⑥《西昌宗教界时事座谈会》,《天风》第11卷第22期,1951年6月9日,第15页;《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总部会议记录》(1952年11月24日),四川档,建川50—436。

⑦编者:《检讨 批评 学习与工作》,《边疆服务》复刊第1期,1950年3月,第1—2页。

说“本年度我们拟建议总部总会不再轻易聘请宗教干事,免得造成不良影响”。

然而,由于时代需求的变化及各种内外原因,边疆服务逐渐陷入困境,一些业已开展的工作也被迫终止。例如,边部曾计划于1948年夏在两个服务区内各建新式医院一所,后因货币贬值的影响,乃决定先建杂谷脑医院,以解决该区范围内没有一所正式医院的问题。经过近一年的筹备,所需建材大部齐备,医院图样由华西大学建筑师杨介眉设计。“他们本来准备要把医院扩大规模的,修成西南民族地区最大的医院,银子都拨来了,已经买了好多石灰了。就在这时解放了,这项大工程就这样停下来了。这部分银子也都交给政府了。”1950年初,边疆服务部在回顾过去一年的工作时说:“川西、西康两区的经常工作,过去的一年都照常进行。”但一年后则表示:“这一年来政府对于少数弟兄民族的卫生医药及文化工作已有整个的计划,边疆服务的工作似已不再需要私人团体去办,所以我们希望政府能接收现有的工作,我们尽我们所有的人力物力由政府统一领导来完成边疆建设的任务。”已不得已而萌生退意。1952年下半年的工作报告指出:“边部工作已大部分交政府接办,现有两服务区工作渐能自养,在全国大建设的急流中,我部同工学习机会较少,进步较慢,不能适应全国大建设的需要,所以希望今年内政府能将我部现有的工作全部接办,西昌的福音堂完全走上自养,同工们都能热烈参加这全国大规模建设的高潮,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边部“期望”的政府接办在外国经费来源切断之后很快成为事实。成都解放之初,崔宪详一再写信表示全力支持边疆服务,并已拟具面向国内外募捐的计划。但1951年春,边疆服务部接到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通知,称总会已拒绝外国捐款;自1952年起不再为边部募捐,完全停止对服务工作的补助,所有工作能请求政府接办者即应接洽;教会应尽可能走向自立自养,政府不予接办而又无力支持者则停办。此后,边部失去最重要的经费来源,只能靠余款勉强维持,举步维艰。1953年,川西区仅存的属边部负责的威州医院和通化诊所分别在7月和8月被汶川县和理县人民政府接办,川西区工作全部结束。1954年3月,西康服务区结束工作,设在成都的边疆服务部总部已失去存在的必要,于1955年10月31日完全结束工作。

六、结 语

边疆服务运动从1939年底开始,至1955年秋结束,延续16年,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三个不同的时期,内涵多有变化。受篇幅所限,这篇论文当然不足以囊括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所发起的边疆服务运动的全部内容。

王贯三:《川西区一九五一年工作计划》,《边疆服务》复刊第2期,1950年5月,第18—19页。

采访王前钧老人记录,采访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汪洪亮,采访时间:2003年10月20日晚19:30—20:20。

《本部近况:过去一年》,《边疆服务》复刊第1期,1950年3月,第29页。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1951年度第一次半年书面报告》,四川档,建川41—3010。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1952年度第二次半年书面报告》、《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总部会议记录》(1952年11月26日),四川档,建川50—436。

但即便是这种简约的限于个案的历史重建,也已经可以揭示出近代以来在华基督教所发生的某些变化:

过去基督教被视为“洋教”,现在则不仅再次提出“本色化”的口号,而且通过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的成立及其所从事的包括边疆服务在内的各种活动,展示了基督教组织机构的“华”、“洋”分别及“洋教”的部分“华化”。这既是落实基督教精神“普世性”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基督徒民族主义意识的内在驱使。这一变化,进一步推动了酝酿已久却行动缓慢的“三自”运动的开展,唤起了中国基督徒一直存在于心中的中国社会与基督教从“友谊的握手”到“血肉的化合”的质的转变企望。过去基督教会注重吸引信徒皈依上帝的“个人福音”传播,现在则至少有一部分人将关注重心调整到服务社会,以改造社会的实际功效来证明“福音”的存在。边疆服务就是社会福音思潮在中国的一次具体实践,它反映了基督教福音传播方式正在经历的某种变化,而这种变化,与本文开篇即指出的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所经历的变化可以形成某种印证关系。过去基督教的活动多在城市尤其是沿海沿江口岸城市而不甚注意乡村,与天主教比较,这种倾向尤为明显。近人王韬就注意到:“天主教行之最久,亦最远,内地乡落,无所不至;耶稣教则不过通商口岸耳。”边疆服务运动的开展,在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上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它强化了中国基督徒的农村意识,扩大了基督教的活动范围及影响。《中国年鉴》曾将这一运动纳入1930年代中国搞得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的范畴,表明截至1930年代,中国的边地农村也同城市一样,受到基督新教更加密切的关注,而教会所从事的社会福音事业也因此有了较为实在的内容。

更为重要的变化在于中国对基督教传教事业态度的转变。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后长期处于非法状态,得不到官方承认。1860年代以后,中外签订的传教宽容条约虽允许基督教在中国的存在,但朝野人士大多视为异端。中华民国建立之后,虽然“信教自由,载在约法”,但教会方面感受到的更多是排斥甚至攻击,新文化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以政府决策的方式对边疆服务示以支持,使教会方面蓄之甚久的依靠中国国家政权的力量来推进教会事业的愿望第一次在一个特定范围内成为了事实,从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上的全过程考察,这一变化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不过,所有这些变化,与亟亟于中国教会事业发展的边部领袖之期望值还相去甚远。1950年初,《天风》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对包括边疆服务在内的教会事工作了如下的总结评价:“基督教团体今后推进事工应当侧重三方面:劳工、农村和边疆。基督教团体过去所推进的事业,大部分集中在都市,就是在都市里的工作,也没有能够切实的深入基层。虽然基督教团体中不无进步分子,这些人也都在可能范围内做一些劳工福利、改进农村和边疆服务的工作,但因为限于过去教会团体的政策和经费,在这几方面的工作,虽然已经有了意识上的准备,但在进行上还是逗留在表证示范的阶段,好像是一种美丽的点缀似的,并没能成功

王治心:《中国本色教会的讨论》,《青年进步》第79期,1925年1月,第11—16页。

王韬:《菽园文录外编》第3卷,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5页。

Ch'hsien Chang (张启贤), "Religion", *The Chinese Year Book, 1940—1941*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China, 1942), p. 89.

从长时段观察认知基督教在华传教经历的变化这一思路,承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徐跃老师指教提示。

一个普遍的运动,获得什么显著的效果。”在接受改造的特殊年代,教会人士固不宜对自己过去的工作出以赞词,但“没能成功一个普遍的运动”倒还不失为符合事实的历史估量。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远离教会人士初衷的结果呢?

首先需要考虑的因素是社会参与狭隘对服务事工的制约。如所周知,边疆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改造工程,需要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参与,绝非仅凭教会微薄之力就能成事。抗战时期的边疆服务能够取得一定的成绩,与战时后方地位凸显,政府重视,社会动员较为广泛有关。抗战胜利之后边疆服务陷入低潮,反证了社会参与的广泛程度与边疆建设成效的内在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百废待举,看似给基督教会从事边疆服务提供了新的机遇,但此时旧中国社会改造这一艰巨任务,已经纳入人民政府统筹计划、发动全体人民共同承担的范畴。教会从过去的改造社会的力量转变成被改造的对象,其社会角色发生变化,以前是无力独自承担改造中国社会的重任,现在则像是轮不到它来承担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逐渐兴起,教会在一段时间内从中国社会的舞台上淡出实在是不可避免的。

经费拮据是制约边疆服务取得成效的又一个重要因素。虽然一些服务工作可以产生某种经济效益,但标榜传播“基督福音”的边疆服务显然不能以赢利为目的,因而接受外界乃至外国的资助或捐款便成为服务工作能够维持和发展的重要前提。1949年以前边疆服务能持续开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来捐款的支撑。新中国建立之初,人民政府的宗教政策体现了对基督教会和教徒宽容的一面,外来的经济捐助没有立时断绝,正常的宗教活动得以延续,边部人士一度怀抱新的发展希望。但这种状况没能维持多久。导致边疆服务经济来源枯竭的原因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中国在美财产实施冻结,以及中国政府采取的对“接受外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的财产及经费进行“处理”的应付措施。中国政府的举措洵属被迫,非其政策缺乏连贯性,任何主权独立的国家处理类似国际关系时都会这样做。在这种形势下,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暨边部只好服从大局,表示不再接受外国捐款,并以建立董事会以自筹经费的举动来表示响应。但自筹的经费对于业已铺开的服务工作而言只是杯水车薪,边部工作终因经费拮据而被迫停止。

在处理传教与服务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教会内部也没有取得共识。虽然部分教会人士反对将服务当成传教的手段,主张专注社会改造的功效,提出“为服务而传教,不是为传教而服务”的口号,但并未得到所有教内人士的认同,不少边部成员仍然坚持将服务当成传教的手段。1945年圣诞节前,杂谷脑医院院长崔毓珊给边部写信提了几点意见,被边部赞为“最好的礼物”并公诸于杂志。其中一条意见是:“各区工作应多注重宗教工作,虽然生计、医药、教育都重要,可是我们能得到一个真正基督徒,就是增加了我们一份生力军,比方医生医好了十个病人,有的不过道谢一声,或捐点款,不见得就能真正了解本部,若是能得到一个真正教友,便是与本部发生实际关系。”这种认识的存在,说明一些教内人士仍然将宗教使

卢广绵:《改造与新生》,《天风》第9卷第1期,1950年1月14日,第5页。

张伯怀:《本部的回顾与瞻望》(事工检讨会闭会词),《边疆服务》第4期,1943年11月,第7—8页。

《川西动态:圣诞节好礼物》,《边疆服务通讯》第5期,1946年2月,第7页。

命放在高于社会使命的地位。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部分边部同工对宗教事业与社会事业的关系仍然缺乏明确认识。这就不可避免会影响边疆服务工作的开展。

尽管因为活动范围没有能够触及中国广袤边疆的全部以及社会动员不够广泛而被认定为“没能成功一个普遍的运动”,边疆服务对业已开辟的服务区民众而言,则带来了历史性的变化,直接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与前途,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历史印记。随着岁月流逝,随着边疆服务运动被逐渐边缘化,当人们已经开始淡忘这场运动时,曾经受惠于边疆服务的边民却忘不了边部同工为他们做出的牺牲和奉献。1948年9月,彝人傅正达在《边疆服务》上发表文章说,他“代表西康百五十万夷族同胞向边疆服务部致谢”。文章特别指出:边部的服务工作已经竭尽全力,虽成效不甚显著,但“它的力量只有这么大,我们对它不能苛求”。

[作者杨天宏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成都,610064]

(责任编辑:杜承骏)

书 讯 ·

《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

朱浒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50.4万字,36元

本书在充分借鉴和反思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丰富和扎实的史料,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晚清义赈的兴起和发展,深入、细致地揭示了中国救荒事业近代化的复杂过程,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中国近代救荒史的研究。本书以开阔的视野,把义赈活动置于晚清社会变局的大背景下,深刻剖析了其与社会变迁、特别是与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为探讨“中国近代化落实过程”提出了重要的、具有启发意义的新思路。针对以往学界在义赈性质和形成机制上存在的看起来截然不同的观点,作者围绕着传统与现代、内发性冲突与外部冲击、国家与社会、地方性与普遍性等诸多二元范畴,展开了颇具说服力的辨析,进而对其背后潜在的研究模式,尤其是“冲击—回应”与“中国中心观”两种模式之争,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为人们提供了甚有价值的参考。

傅正达:《夷民的呼声》,《边疆服务》第26期,1948年9—10月,第2—4页。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No. 6 , 2006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oncepts of “ Civilization ” and “ Culture ” and Their

Historical Practice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Huang Xingtao (1)

In the historical discourse of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 China 's traditional concepts of “ civilization ” and “ culture ” underwent a transformation. First , they shed to a great extent their disdain for material , economic and military affairs , and formed a new and modern concept of “ civilization ” (the modern concept of “ culture ” in the broad sense) with an intrinsic idea of progress. Then —along another axis— they returned to some key element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 civilization ” and “ culture ” as contrasted with “ militarization ” and materialization , thereby gaining new conceptual resources and constructing a new concept of “ culture ” in the narrow sense. Finally , they were re-formed into a contradictory conceptual structure of modern “ culture ” encompassing both the broad and narrow senses. The process by which these two important concepts were formed and developed was also a process of practice through which the Chinese people at the time used them to reform society. During the Reformation of 1898 , the modern concept of “ civilization ” was already gradually gaining prevalence among progressive intellectuals , bringing with it a whole series of modern guiding values , and becoming an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fully carrying out the reform movement that cannot be overlooked. At the same time , the emergence of the concept of “ culture ” in the narrow sense , and its intertwining with the broader concept influenced the progression of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China 's Christian Church in War and in Social Transformation : A Study of the Frontier Service of the General Union of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 Yang Tianhong (35)

In the late 1930s , the General Union of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hereafter “ GUCCC ”) initiated a movement to provide services to the western minority regions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the rear area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GUCCC appealed to accomplished person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hurch to go to the southwest minority regions —which were called “ frontiers ” at the time —to provide services in areas such as livelihood , education , health and medical treatment , and so on. In addition , the General Union cooperated with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scholars to do research on the frontier , forming an interplay between service and research , and promoting social progress in remote areas , especially in the Sichuan-Xikang region ,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studies related to the frontiers. The frontier service was the first such large-scale Christian activity undertaken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ince Christianity was first preached in China in 1807. This movement lasted until 1955. It not only underwent the baptism of the war , but also experienced the drastic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the early period of New China. The history of the frontier service provides a very important and hitherto unstudied example through which we can understand the changes that Christian missionary activities underwent in modern China.